

陕北宋金石窟大日如来图像类型分析 *

李静杰

内容提要 作者等经过历年调查,在延安市所属区县的宋金石窟中发现一批密教大日如来图像。这些图像包括多种存在形式,或属于金刚界曼荼罗成身会内容,或为金刚界与胎藏界大日如来组合,或为金刚界大日如来与《华严经》毗卢遮那佛混合,反映了唐代密教艺术的后续发展情况。其大日如来组织在当地以净土信仰为核心的程式化图像体系之中,密教成就法身思想与显教修菩萨行、往生净土等内涵,共同发挥教化众生的作用。陕北宋金石窟大日如来图像构成中国密教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充并深化了学界以往的认知范围和程度。

关键词 陕北宋金石窟 金刚界大日如来 胎藏界大日如来 毗卢遮那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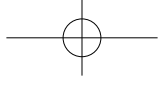
自开元三大士金刚智、善无畏、不空传译《金刚顶经》、《大日经》两部大法之后,中国汉传佛教体系中的正纯密教图像逐渐流行开来,然此类图像相对数量庞大的显教图像而言,仍旧十分稀少。笔者等经历年调查陕北石窟^{〔1〕},在延安市所辖富县、宝塔区、安塞、志丹、子长五区县的六处宋金石窟中,见有大日如来图像,其中多数属于首次发现。这些大日如来与相关图像组合情形各异,内涵丰富,反映了唐代密教艺术的后续发展情况,扩充了学界以往对中国密教图像的认知范围并有助于深化相关研究。

以密教世界观,宇宙万物万象皆为大日如来之显现。金刚界显其智德,表差别之相,说明精神世界的本体和现象;胎藏界现其理性,表本有之相,说明物质世界的本体和现象。大日如来智德坚固不为一切烦恼所破,亦无所不破诸愚痴和缠缚,是为金刚界。如来本有之永恒悟性从大悲生,孕在一切之中,是为胎藏界。图示《金刚顶经》、《大日经》思想体系中诸尊的主从关系,即金刚、胎藏两界曼荼罗。宋辽金时期密教思想延续发展,而且出现与《华严经》思想交汇融合的情况,于是密教大日如来与《华严经》教主毗卢遮那佛混合造型也流行开来。

已知陕北宋金石窟的六处大日如来图像,可以划分为六种存在形式:其一为金刚界大日如来与四波罗蜜菩萨组合;其二为金刚界五佛(此二种属于金刚界曼荼罗成身会内容,改变曼荼罗原来环

* 本稿为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两宋时期佛教图像研究》(立项批准号10BF050)中的部分内容。

〔1〕 笔者于2006、2007、2012年与清华大学研究生进行了三次系统调查,参加调查的还有谷东方、李静、范丽娜、陈红帅、廖蕊雅、林志镐、齐庆媛、黄文智、王芳、杨筱、孙明利,台北艺术大学林保尧教授及其助手李冠畿、陈怡安、徐逸泓、蔡秉彰,以及首都博物馆邢鹏也参加了考察。



〔图一〕金刚界曼荼罗示意图（依据元禄本金刚界曼荼罗制作）

四印会	西 一印会	理趣会
南 供养会	成身会	降三世会 北
微细会	三昧耶会 东	三昧耶会 降三世

形配置为并列式配置)；其三为金刚界大日如来与胎藏界大日如来组合，较多地保留了唐代密教色彩；其四为金刚界大日如来与《梵网经》教主卢舍那佛混合；其五为金刚界大日如来与《华严经》教主毗卢遮那佛混合，此二种关联《华严经》思想；其六为金刚界大日如来与二胁侍组合，吸收了显教图像因素。

一 金刚界大日如来与四波罗蜜菩萨组合

金刚界大日如来与四波罗蜜菩萨组合，为金刚界九会曼荼罗之成身会内容。依据京都教王护国寺藏元禄本金刚界曼荼罗，九会各以大圆轮及周围方域为之〔图一〕^{〔1〕}，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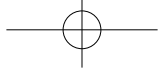
身会处在九会中心区域，统摄全局，系最重要的一会，故名根本成身会〔图二〕。成身会一者现大日如来应化诸身，救济并教化众生，二者表众生成就大日如来智德，与之合为一体，达成法身，因名成身会。

成身会分内、中、外三区，内区大圆轮内配置中、东、南、西、北五月轮。中月轮的中心居金刚界大日如来，四周自下方开始按顺时针方向，金刚、宝、法、羯磨四波罗蜜(又名四亲近)菩萨围绕。依然自下方开始按顺时针方向，在东、南、西、北四方月轮内，分别配置阿閼、宝生、无量寿、不空成就四佛，各有四亲近菩萨围绕，总合十六亲近菩萨。四佛之间自东南方开始按顺时针方向，相间配置金刚嬉、金刚鬘、金刚歌、金刚舞内四供养菩萨。大圆外四隅配置地、水、火、风四天。中区即第一重回廊，四方配置金刚钩、金刚索、金刚锁、金刚铃四摄菩萨，四隅配置金刚香、金刚花、金刚灯、金刚涂外四供养菩萨，相间部位配置贤劫千佛。外区即第二重回廊，布列三界二十诸天，名为外金刚部。于是，形成六十一尊并贤劫千佛之曼荼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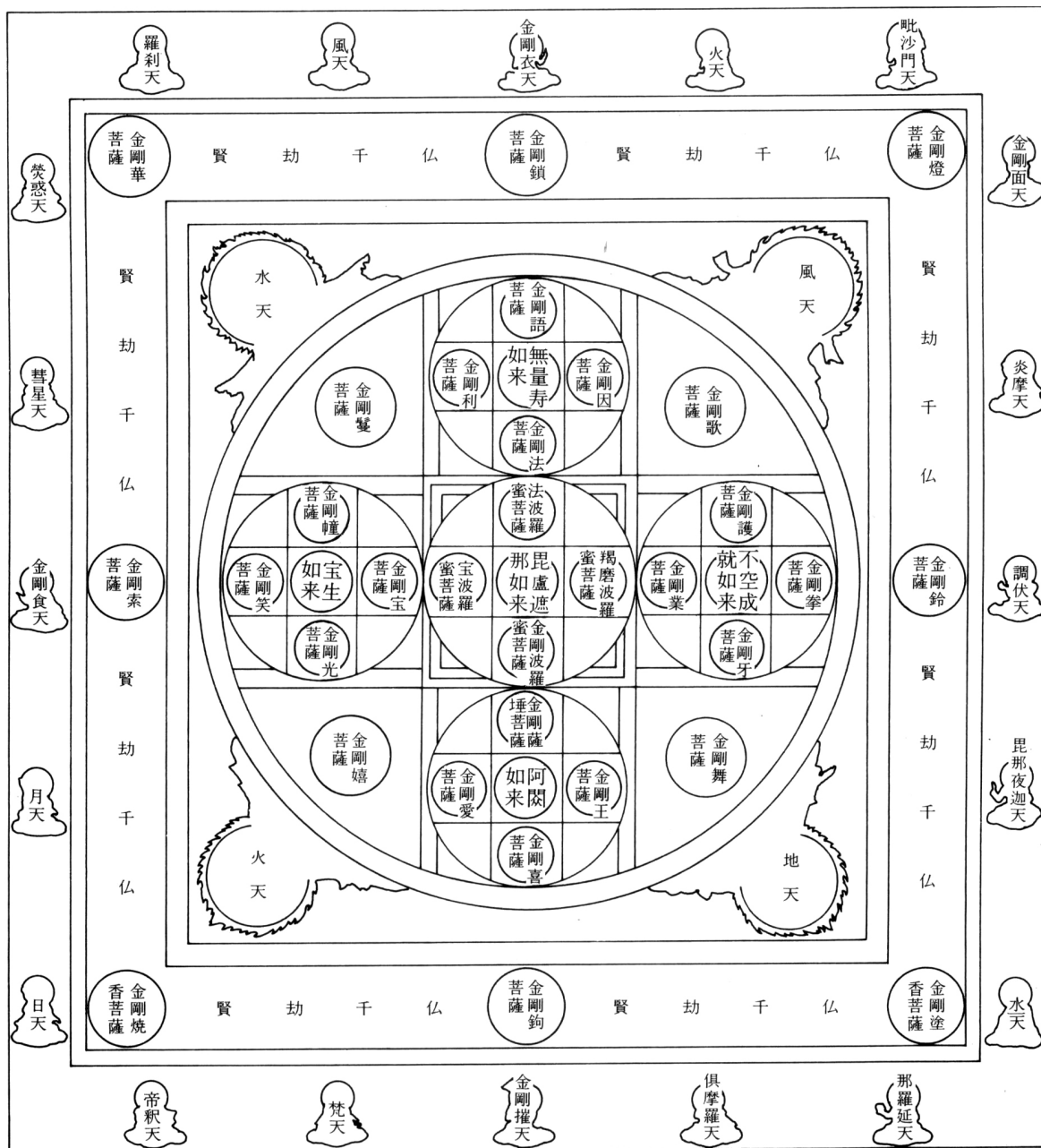
依据《金刚顶经》，大日如来、四方四佛、四波罗蜜菩萨形成循环生成关系^{〔2〕}。四佛智生出四波罗蜜菩萨，四波罗蜜菩萨处在因地修行之位，为三世一切诸圣贤生成养育之母，印成大日如来(即毗卢遮那佛)法界体性智，并生出四佛。又据《金刚顶瑜伽三十七尊出生义》，“四亲近菩萨即彼四波罗

〔1〕〔日〕石田尚丰：《两界曼荼罗の智慧》，东京美术刊，1979年。又，吴立民、韩金科：《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

〔2〕（唐）不空译：《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论》（《大正藏》第三十二卷）：“于三十七尊中，五方佛位各表一智。东方阿閼佛因成大圆镜智，亦名金刚智也。南方宝生佛由成平等性智，亦名灌顶智也。西方阿弥陀佛由成妙观察智，亦名莲华智，亦名转法轮智也。北方不空成就佛由成所作智，亦名羯磨智也。中方毗卢遮那佛由成法界智为本。已上(笔者注)四佛智出生四波罗蜜菩萨焉，四菩萨即金、宝、法、业也，三世一切诸圣贤生成养育之母，于是印成法界体性中流出四佛也。”(页574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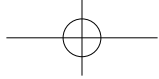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图二〕京都教王护国寺藏元禄本金刚界曼荼罗成身会构造图 采自《两界曼荼罗の智慧》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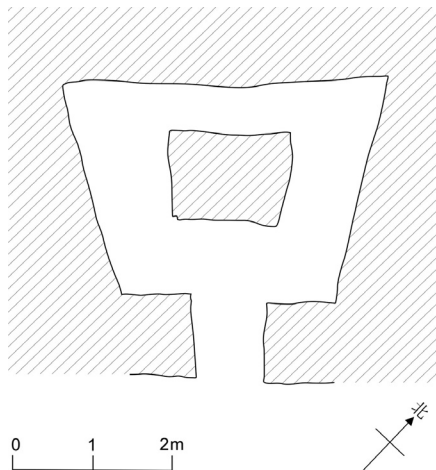
蜜印焉，无量大悲体于是而生，无量方便拥护于是而出”^{〔1〕}。四波罗蜜菩萨救济一切众生之意明矣。

富县柳园北宋庆历三年(1043)石窟〔图三、图四〕，通高217厘米，宽433厘米，进深277厘米，为一小型石窟，也是陕北宋金石窟中唯一的中心柱窟。在中心柱前面上部尖拱龕内，浮雕结跏趺坐主尊并四胁侍菩萨，人物头部及部分手臂被有意砸毁，给图像辨识带来一定困难〔图五、图六、图

〔1〕 (唐)不空译：《金刚顶瑜伽三十七尊出生义》，《大正藏》第十八卷页298上。



〔图三〕富县柳园北宋庆历三年(1043)石窟平面图
(齐庆媛绘)



〔图四〕富县柳园北宋庆历三年(1043)石窟前面观



〔图五〕富县柳园北宋庆历三年(1043)石窟中心柱前面上部龕像



〔图六〕富县柳园北宋庆历三年(1043)石窟中心柱前面上部龕像主尊



〔图七〕富县柳园北宋庆历三年(1043)石窟中心柱前面上部龕像左侧胁侍菩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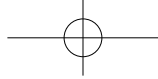
七〕。由台座形式、人物组合及持物分析,应为金刚界大日如来与四波罗蜜菩萨组合。

主尊结跏趺坐在方形基础仰莲台座上,基础前面露出三狮子前身,左侧者已模糊,中央与右侧者尚可辨识。三狮子座为唐宋时期金刚界大日如来像习惯采用的座式,依据《尊胜佛顶修瑜伽法轨仪》^{〔1〕},系七狮子座的简化形式^{〔2〕}。诸如邛崃盘陀寺石窟中唐前后金刚界大日如来像〔图八〕、扶风法门寺地宫后室出土晚唐八重宝函之第四重金函金刚界大日如来像^{〔3〕}、日本爱知县陶瓷资料馆藏辽代

〔1〕 (唐)善无畏:《尊胜佛顶修瑜伽法轨仪》(《大正藏》第十九卷)卷上《尊胜佛顶真言修瑜伽画像品》:“其所画布绢麤等大小随意。中心画大圆明白色,又大圆明分为九圆。(中略)中圆画毗卢遮那如来,头戴五佛冠,种种宝华光,于七师子座上结跏趺坐,手结法界印。”(页376上)

〔2〕 [韩]朴亨国:《大阪金剛寺金堂の金堂界大日・不动・降三世の三尊形式に関する一考察》,《佛教艺术》252号,2000年。

〔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著:《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图版113,文物出版社,2007年。



石刻金刚界大日如来像^{〔1〕}，三者均为浮雕造像，在仰莲台座下露出三狮子前身，用来代表七头狮子的存在。其中邛崃盘陀寺石窟大日如来像、爱知陶瓷资料馆大日如来像的三头狮子，在方形基础前作正面像排列，与富县柳园石窟者一致。富县柳园石窟三狮子分别处在龕中的做法，近似盘陀寺石窟三头狮子之间用立柱间隔的形式。三狮子台座造型应来源于共同粉本，并形成唐宋时期金刚界大日如来像的一种重要台座形式^{〔2〕}，是为判断柳园石窟三狮子座上主尊像尊格的主要依据之一。

该主尊作菩萨形貌，左手自然放在腹前腿上，右手前举似施无畏印，非金刚界大日如来通常采用的智拳印。其身着菩萨装，胸束带，翻袖，披铠甲，肩挎帔帛，披铠甲造型亦不见于一般化菩萨装大日如来像。中晚唐以来菩萨身披铠甲造型逐渐流行，以坚固铠甲譬喻菩萨精勤修行^{〔3〕}。依据《金刚顶经》^{〔4〕}，大毗卢遮那如来(即大日如来)入极难敌精进大菩萨三昧，具德金刚手成坚固甲冑，出生极难敌精进大菩萨身，复与大毗卢遮那如来合为一体。因此，就经典而言披铠甲装束适用于金刚界大日如来造像。上述爱知县陶瓷资料馆大日如来披云肩做法，与披铠甲情况类似。翻袖作法则沿用了初唐以来天王、菩萨像一直流行的造型特征。

〔图八〕邛崃盘陀寺石窟中唐后金刚界大日如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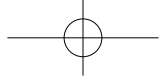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主尊两侧各侍立二菩萨，面目及宝冠式样已无法得知，各身着长裙，肩挎帔帛，胸部微袒。两内侧菩萨各自两手执一长茎莲花，内侧手在下，外侧手在上，为对称造型，两外侧菩萨的左右手在腹前握一物(物象不明)。基于主尊为金刚界大日如来的推断，自然联想起与之组合的金刚、宝、法、羯磨四波罗蜜菩萨，而且这一时期几乎不见显教尊像胁侍四菩萨的情况。法门寺地宫秘龕出土唐咸

〔1〕 前掲〔韩〕朴亨国《大阪金刚寺金堂の金堂界大日・不动・降三世の三尊形式に関する一考察》。

〔2〕 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1067)第3窟中心佛坛三佛之左尊阿弥陀佛，同样采用三狮子仰莲台座，推测可能受到金刚界大日如来台座影响，说明三狮子仰莲台座不完全应用于金刚界大日如来。不过，就目前资料可知，坐在三狮子仰莲台座的菩萨像，基本可以推断为金刚界大日如来。

〔3〕 齐庆媛：《中国北方地区辽代与北宋菩萨像造型分析》，《艺术史研究》第十二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北宋)施护译：《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大正藏》第十八卷)卷三《金刚界大曼拏罗广大仪轨分》：“尔时世尊复入极难敌精进大菩萨三昧，出生羯磨加持金刚三摩地。(中略)即彼如是具德金刚手成坚固甲冑，为出现已，即入世尊大毗卢遮那如来心，合为一体。从是出生大金刚甲冑像，住佛掌中，然后从彼金刚甲冑像中出(页347下)一切世界极微尘量等如来像，作一切如来善护广大仪轨事业等，以一切佛神通游戏。广施作已，彼极难敌精进性于金刚萨埵三摩地，妙坚牢故合为一体，出生极难敌精进大菩萨身，住世尊大毗卢遮那如来心。”(页348上)



〔图九〕法门寺地宫出土唐咸通十二年（871）鎏金银函上面图像
采自《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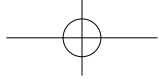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通十二年(871)鎏金银函之四波罗蜜菩萨〔图九〕,一概左手执长茎莲花,右手施印相或持宝珠、羯磨,与柳园石窟者有相通之处。在中外现存金刚界成身会图像中,不见内四、外四供养菩萨及四摄菩萨执长茎莲花情形,因此,柳园石窟四胁侍菩萨大概只有作四波罗蜜菩萨考虑的余地。不过,柳园石窟四波罗蜜菩萨为立姿,有别于现存四波罗蜜菩萨实例一概坐姿表现^{〔1〕},应受到显教造像排列方式影响。

那么,柳园石窟主尊及四胁侍菩萨有无其他尊格可能呢?纵览陕北宋金石窟,作为主体内容表现的菩萨像,只有水月观自在、文殊、普贤、地藏四种,这四种菩萨各有特定造型,迥然有别于柳园石窟主尊及四胁侍造型。再者,此四种菩萨从未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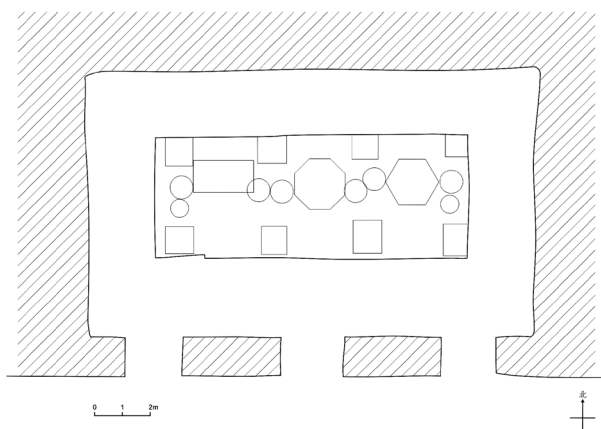
主尊表现,只有少许石窟水月观自在出现在次主尊的位置。由此看来,柳园石窟主尊及四胁侍菩萨,恐只有金刚界大日如来与四波罗蜜菩萨组合之可能。

柳园石窟金刚界大日如来与四波罗蜜菩萨组合,改变曼荼罗原来环形配置为平列式配置。该窟中心柱大日龕下表现形似老君的长须人物(头部遭破坏),中心柱另三面表现水月观自在、地藏与十王、禅宗六代祖师,后壁上层表现三佛(释迦、弥勒、阿弥陀)、骑狮文殊与乘象普贤菩萨,后壁下层表现十六罗汉,两侧壁表现千佛,表明全窟图像不存在大曼荼罗结构。金刚界大日如来与四波罗蜜菩萨组合,意在使众生成就大日如来智德并达成佛身,形成该窟主要内容之一。三佛与骑狮文殊及乘象普贤菩萨组合,意在众生修菩萨行,将来往生到净土世界,为该窟另一主要内容。十六罗汉及禅宗六代祖师组合用来表述传法思想,地藏与十王表述地狱救济的同时,也宣扬了因果报应思想。长须者若果为老君,则添加了道教因素,与天地长存之道亦契合密教之宇宙观。值得注意的是,大日

〔1〕 据赖依缙女士研究,唐密四波罗蜜菩萨在经典和造型上存在两大系统。其一,基于金刚智译《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表现,金刚界五佛及四波罗蜜菩萨乘鸟兽座,以西安香积寺出土中唐前后石雕小塔、日本大津三井寺藏晚唐纸本五部心观图像为代表。其二,基于不空译《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表现,台座无鸟兽,以扶风法门寺出土晚唐鎏金银函及捧真身菩萨像为代表,各手执长茎莲花。赖依缙:《香积寺唐代奉献小塔—中国出土的金刚界〈五部心观〉系图像》,《故宫文物月刊》314号,2009年。该文进而基于手印分析香积寺小塔四方四佛,认为可能是表现“一切面安立”的金刚界大日如来。富县柳园石窟四波罗蜜菩萨为立像,无法就台座形式归类,而其手执长茎莲花造型则见于后一系统。



〔图十〕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1067）第3窟平面图（谷东方绘）



〔图十一〕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1067）第3窟前壁中门上方金刚界五佛



如来尽管为主尊，但所占画面小于后壁三佛，全窟显教图像数量远多于密教图像且二者缺乏内在联系，因而难以说明其大日如来在当窟的绝对主导作用。

中国现存金刚界大日如来与四波罗蜜菩萨组合图像，确凿实例过去仅见于上述扶风法门寺出土晚唐宝函成身会图像。如果柳园石窟金刚界大日如来与四波罗蜜菩萨组合的推论能够成立，则填补了宋代实例的空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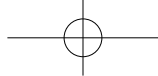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二 金刚界五佛

金刚界五佛，即中心大日如来与东方阿閼、南方宝生、西方无量寿、北方不空成就四佛的组合，依次代表法界体性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五智汇成大日如来之法身，大日如来为诸佛总体，为化度众生而示现诸佛、菩萨身。金刚界五佛系成身会核心内容，或可看作此会的缩影，实例见于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1067）第3窟。

该窟通高560厘米，宽1643厘米，进深978厘米，为超大型设支柱佛坛窟〔图十〕。在前壁中门上方浮雕金刚界五佛〔图十一〕，五佛由曼荼罗的环形配置改变为并列式配置，各结跏趺坐束腰仰莲台座上。从左向右（以物象自身为基准，下同）第一尊右手施与愿印，为南方宝生佛。第二尊双手施禅定印，为西方无量寿佛。第三尊双手施智拳印，为金刚界大日如来。第四尊右手施触地印，为东方阿閼佛。第五尊右手施无畏印，为北方不空成就佛。

在门楣上浮雕金刚界五佛的做法，曾见于印度比哈尔邦出土帕拉朝后期二实例^{〔1〕}。其一，金刚界五佛与四菩萨（四波罗蜜菩萨？）相间配置，五佛均作佛陀形貌〔图十二〕。其二，五佛中尊大日如来作菩萨形貌，余四佛作佛陀形貌〔图十三〕。自印度到中国门楣上一再表现金刚界五佛，这种情况

〔1〕 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



〔图十二〕印度比哈尔邦出土帕拉朝后期石门浮雕金刚界五佛与四菩萨



〔图十三〕印度比哈尔邦出土帕拉朝后期塔门浮雕金刚界五佛



似乎与金刚门概念关联。《金刚顶经》陈述^{〔1〕}，金刚界五佛住须弥山顶金刚摩尼宝峰楼阁之中，楼阁相当于成身会曼荼罗大圆轮部分，成身会下方为楼阁正门即东门，名为金刚门。金刚一名喻大日如来智德坚固不坏，譬如金刚，众生入金刚门就意味着五佛五智加持己身，成就大日如来智德并与之合为一体，达成永恒的法身。子长钟山第3窟金刚界五佛处在中门即主门之上，进入石窟者受到五佛五智加持的用意十分明了，不失为精心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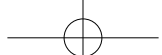
子长钟山第3窟，中心佛坛配置三佛（释迦、弥勒、阿弥陀）及骑狮文殊、乘象普贤菩萨，经由菩萨行将来往生净土世界的思想形成该窟主题，为一般化大乘显教内容。可见，虽然该窟门楣金刚界五佛图像与佛坛图像形成组合关系，但前者在巨大石窟中所占画面微小，所处位置也无法与佛坛造像比较，只是在庞大显教图像阵容中添加了密教图像符号而已。

汉传佛教金刚界五佛实例遗存相对较多，一般具备曼荼罗构造。唐密遗存诸如，在西安安国寺遗址出土的一批盛中唐之际圆雕白石佛教造像中，见有四方佛之南方宝生佛^{〔2〕}，就四佛通常与金刚界大日如来组合的情形推测，该宝生佛可能是成身会曼荼罗的组成部分。前述法门寺地宫秘龕出土唐咸通十二年（871）鎏金银函，金刚界五佛如其方位表现在上面和四个侧面，组合为成身会曼荼罗。西安碑林区出土一面中晚唐前后佛像圆镜^{〔3〕}，表现金刚界五佛为中心的成身会曼荼罗。这些实例或出土于唐都长安，或属于唐皇室供物，反映了唐代曼荼罗图像的发展情况。辽王朝是唐代

〔1〕（唐）不空译：《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大正藏》第十八卷）卷上、中《金刚界大曼荼罗广大仪轨品》：“时世尊金刚界如来当彼刹那顷，现证等觉一切如来平等智。（中略）时一切如来，（中略）由此往诣须弥卢顶金刚摩尼宝峰楼阁。至已，金刚界如来以一切如来加持，于一切如来狮子座一切面安立。时不动如来、宝生如来、观自在王如来、不空成就如来一切如来，以一切如来加持自身，（中略）观察四方而坐（页208上、中）。（中略）金刚钩大菩萨身，依世尊金刚摩尼宝峰楼阁金刚门中月轮而住，钩召一切如来三昧耶。”（页215中）

〔2〕程学华：《唐贴金画彩石刻造像》，《文物》1961年第7期。又，〔日〕水野敬三郎：《西安大安国寺遗址出土之宝生如来像について》，《佛教艺术》150号，1983年。

〔3〕1972年碑林区第三建筑公司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密教文化的主要继承者，现存辽代佛塔多有保存金刚界五佛，如辽重熙十三年(1044)前后包砌的朝阳北塔塔身四面浮雕四佛，推测塔心室内原放置金刚界大日如来，形成金刚界五佛组合^①。辽清宁二年(1056)前后建造的应县木塔，第三层配置四方四佛^②，与第五层中心金刚界大日如来组合成五佛^③，连同此大日如来周围可能作为四波罗蜜菩萨、内四供养菩萨表现的八身菩萨^④，契合佛塔中成身会曼荼罗仪轨^⑤。再者，法门寺鎏金银函顶面表现金刚界大日如来、四波罗蜜菩萨、内四供养菩萨，四个侧面表现四方四佛的空间布局，颇类似于应县木塔第三层、第五层的图像设置，从而加强了上述推测的可能性。以上实例大多属于曼荼罗式构造，目前所知与金刚门概念关联的金刚界五佛，仅有子长钟山第3窟一例。

三 金刚界大日如来与胎藏界大日如来组合

在中国汉传佛教遗存中，金刚界大日如来与胎藏界大日如来组合实例十分罕见。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晚唐捧真身菩萨像束腰台座，表现金刚界五佛种子、胎藏界中台八叶院诸尊种子，形成金刚界曼荼罗与胎藏界曼荼罗组合^⑥，这是两部大法在中国融合发展的结果。然而，迄今为止未知金刚界大日如来与胎藏界大日如来组合实例，安塞沐浴北宋晚期石窟所见者尚属首例。

该石窟通高274厘米，宽512厘米，进深402厘米，系中型设支柱佛坛窟〔图十四〕。在左右壁中部亚字形基础仰莲台座上，各自高浮雕一结跏趺坐菩萨〔图十五、图十六〕，形成一对图像。就当时流行的显教菩萨像而言，水月观自在数量最多，地藏偶尔可见，此两者均有特定造型，有别于该窟左右壁侧壁中部所见者。通常成对表现的骑狮文殊、乘象普贤菩萨已见于两侧壁前部，亦排除其可能。那么，这一对菩萨到底何等尊格呢？就其造型与所处比较重要位置推测，只能是金刚界大日如

①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编：《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页116—122，文物出版社，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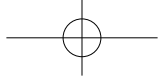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② 陈明达编著：《应县木塔》图版9，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③ 前揭《应县木塔》图版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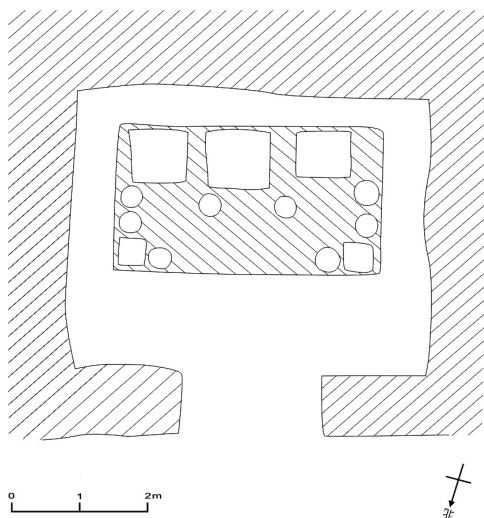
④ 大日如来周围环列八身结跏趺坐菩萨，这些菩萨手部全然不存，在手印和持物不明的情况下，难以确切辨识各自尊格。以往学界依据盛唐不空译《八大菩萨曼荼罗经》等，比定为八大菩萨，笔者以为还存在其它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四方菩萨坐束腰三层莲瓣仰莲台座，身披云肩，而四隅菩萨坐束腰两层莲瓣仰莲台座，身披铠甲，示意这是两类菩萨组合。参考扶风法门寺鎏金银函图像，不排除四方、四隅者分别作为四波罗蜜、内四供养菩萨表现的可能。

⑤ 前揭《金刚顶瑜伽三十七尊出生义》：“由大圆镜智，厥有金刚平等现等觉身，则塔中方东阿閼如来也。由平等性智，厥有义平等现等觉身，即塔中方之南宝生如来也。由妙观察智，厥有法平等现等觉身，即塔中方之西阿弥陀如来也。由成所作智，厥有业平等现等觉身，即塔中方之北不空成就如来也。由四如来智出生四波罗蜜菩萨焉，盖为三际一切诸圣贤生成养育之母。于是印成法界体性智自受用身，即塔之正中毗卢舍那如来也。”（页298上）

⑥ 前揭吴立民、韩金科：《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页268—333。



〔图十四〕安塞沐浴北宋晚期石窟平面图（李静绘）



〔图十五〕安塞沐浴北宋晚期石窟左壁中部菩萨



〔图十六〕安塞沐浴北宋晚期石窟右壁中部菩薩



〔图十七〕奥里萨邦Udayagiri寺遗址出土帕拉朝前期胎藏界大日如来



〔图十八〕奥里萨邦Udayagiri寺遗址出土帕拉朝前期金刚界大日如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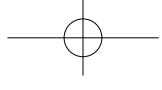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来与胎藏界大日如来组合。

左壁中部菩薩两手在腹前连接，应为禅定印的抽象表现，头戴莲花冠，身披云肩。其印相与胎藏界大日如来一致，可比实例如印度奥里萨邦Udayagiri寺遗址出土帕拉朝前期胎藏界大日如来像〔图十七〕。右壁中部菩薩风蚀严重，亚字形基础前面与两侧露出四头狮子前身，形成四狮子座。其上菩薩两手当胸，似施智拳印，头戴宝冠，身着翻袖衣。四狮子座不见于显教菩萨像，应为七狮子座的简化形式，针对金刚界大日如来表现，这是

迄今所知孤例。智拳印则是金刚界大日如来特征，可比实例如奥里萨邦Udayagiri寺遗址出土帕拉朝前期金刚界大日如来像〔图十八〕。胎藏界大日如来与金刚界大日如来，分别说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本体和现象，二者组合无异于宇宙万物、万象真理性认识之总汇。

金刚界曼荼罗成身会之大日如来面向东方，胎藏界曼荼罗中台八叶院之大日如来面向西方。陕北宋金石窟通常以出入口所在方向为正方向（即南方或假想南方）^{〔1〕}，那么沐浴石窟（实际坐南面北）

〔1〕 李静杰：《唐宋时期三佛图像类型分析》，《故宫学刊》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



左壁(即假想东壁)胎藏界大日如来面向西方,对应右壁(即假想西壁)金刚界大日如来面向东方,合乎两界曼荼罗大日如来的朝向,这可能是基于曼荼罗设计的结果。

在左右壁前部与大日如来平行的位置,分别浮雕骑狮文殊、乘象普贤菩萨[图十九:1、图十九:2]。中唐《华严经》宗祖师澄观认为^①,文殊、普贤代表菩萨修行过程为因,透过现象认识事物本质为果,即成就法身毘卢遮那佛,亦等同于密教大日如来。已而,左右壁胎藏界大日如来与金刚界大日如来,连同骑狮文殊、乘象普贤菩萨,表述了一体化思想,形成华严、密教思想和图像的有机结合。

该窟佛坛造像缺失,从三个台座并列情形推测,原初配置三佛(释迦、弥勒、阿弥陀)的可能性很大。后壁与左右壁布列罗汉群像,前壁布列千佛。三佛、罗汉群像为陕北宋金石窟习惯性表现,与两侧壁大日如来没有必然联系,石窟整体不存在曼荼罗构造。如前所述,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晚唐金胎两界曼荼罗合成实例,沐浴石窟金刚界大日如来与胎藏界大日如来组合,则体现了晚唐以来的传统。

〔图十九:1〕安塞沐浴北宋晚期石窟左壁立面图(李静绘)



〔图十九:2〕安塞沐浴北宋晚期石窟右壁立面图(李静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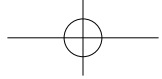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四 金刚界大日如来与《梵网经》教主卢舍那佛混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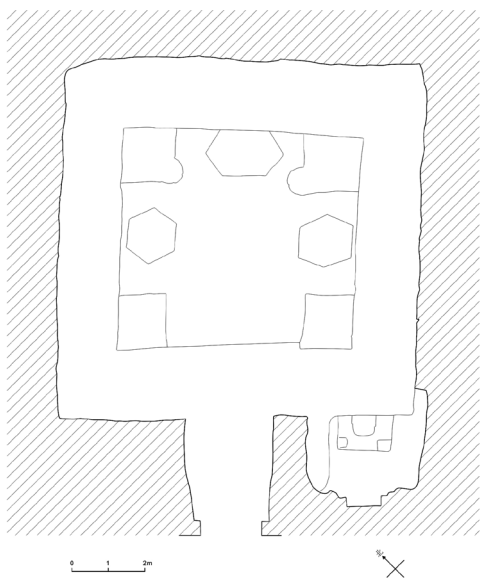
卢舍那佛为六十卷《华严经》教主,与八十卷《华严经》教主毗卢遮那佛同一尊格,也是属于《华严经》系统的《梵网经》教主。《梵网经》陈述^②,卢舍那佛居莲花台上,其台有千叶,一叶一世界,卢舍那佛化身为千释迦佛,居此千世界。因此,装饰千佛的莲台成为卢舍那佛的标志性特征。实例见于富县石泓寺金皇统元年(1141)一贞元二年(1154)第2窟。

① (唐)澄观《三圣圆融观门》(《大正藏》第四十五卷):“三圣者,本师毗卢遮那如来,普贤、文殊二大菩萨是也。(中略)三圣之内,二圣为因,如来为果。(中略)二圣法门既相融者,则普贤因满,离相绝言,没因果海,是名毗卢遮那。”(页617)

② (后秦)鸠摩罗什译:《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大正藏》第二十四卷)卷上:“卢舍那佛(中略)住莲花台藏世界海。其台周遍有千叶,一叶一世界为千世界,我化为千释迦据千世界。后就一叶世界,复有百亿须弥山、百亿日月、百亿四天下、百亿南阎浮提,百亿菩萨、释迦坐百亿菩提树下,各说汝所问菩提萨埵心地。其余九百九十九释迦,各各现千百亿释迦亦复如是。千花上佛是吾化身,千百亿释迦是千释迦化身。吾已为本原名为卢舍那佛。”(页997下)



〔图二十〕富县石泓寺金皇统元年(1141)第2窟平面图(谷东方绘)



〔图二十一〕富县石泓寺金皇统元年(1141)第2窟左壁金刚界大日如来(李冠畿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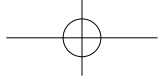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该窟通高540厘米,宽1030厘米,进深1070厘米,为超大型设支柱佛坛窟〔图二十〕。左壁后部高浮雕以弥勒佛为中心的一铺三尊像,左尊为文殊菩萨。右尊佛陀结跏趺坐在亚字形基础仰莲台座上,莲花台每叶装饰一禅定坐佛,应为《梵网经》所述千释迦佛居千世界的表现,那么莲花台上佛陀则是卢舍那佛〔图二十一〕。然而,该卢舍那佛作金刚界大日如来智拳印,并非南北朝隋唐流行的施无畏印,形成梵网经卢舍那佛与金刚界大日如来混合造型。密教与《华严经》法身观的共通性成为两者混合的基础,认为世界所有事物都是大日如来或毗卢遮那佛的显现,即包容一切的法身观。就现存实例可知,南北朝、隋代基于六十卷《华严经》表现的卢舍那佛一概作佛陀形貌,唐宋时期基于八十卷《华严经》表现的毗卢遮那佛作菩萨形貌者多于佛陀形貌者,而密教大日如来自印度以来即存在佛陀与菩萨两种形貌。因此,此石泓寺第2窟及下述城台石窟之卢舍那佛或毗卢遮那佛与大日如来混合造型,采用佛陀形貌并不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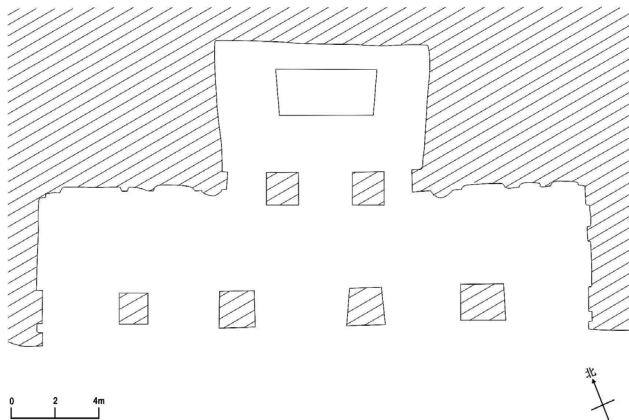
与左壁三尊像对应的右壁后部高浮雕以释迦佛为中心,左右侧分别配置阿弥陀佛和普贤菩萨。左右壁中尊形成现在释迦佛、未来弥勒佛对应配置,连同右壁三尊之左尊阿弥陀佛,构成从娑婆世界到东西方净土世界的思路,二菩萨代表的菩萨行则是实现此目标的基础。金刚界大日如来处在左壁右尊的位置,显然不是着意表现对象,与文殊、普贤二菩萨的关系也不甚紧密。该窟中心佛坛上配置主尊降魔成道释迦佛,以降伏天魔(战乱)为主旨,两侧胁侍代表菩萨行的文殊、普贤菩萨。佛坛造像与左壁大日如来亦无内在联系。

五 金刚界大日如来与《华严经》教主毗卢遮那佛混合

实例见于志丹城台北宋大观二年(1108)—金贞元三年(1155)石窟。该石窟为超大型前廊后室结构,前廊通高430厘米,横宽2532厘米,进深621厘米,后室通高480厘米,横宽977厘米,进深655厘米〔图二十二〕。后室后壁高浮雕三佛〔图二十三〕,各自结跏趺坐在亚字形基础仰莲台座上。中尊两手施智拳印〔图二十四〕,左尊左手施触地印,右手放在腹前腿上,系反向触地印〔图二十五〕,右尊左手放在腹前腿上,右手残缺,原初似施无畏印〔图二十六〕。由手印推知,中尊为金刚界大日如来,左尊作为释迦佛表现可能性较大,在以上两佛尊格基本确定前提下,右侧佛应判



〔图二十二〕志丹城台北宋大观二年（1108）—金贞元三年（1155）石窟平面图
（李静绘）



〔图二十三〕志丹城台北宋大观二年（1108）—金贞元三年（1155）石窟后室后壁 三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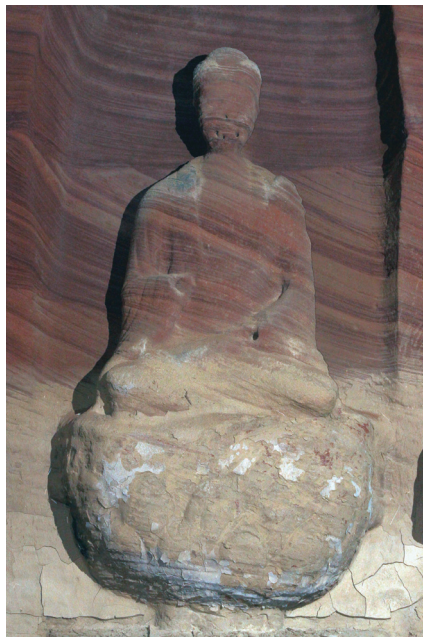
〔图二十四〕志丹城台北宋大观二年（1108）—金贞元三年（1155）石窟后室后壁 三佛之中尊



〔图二十五〕志丹城台北宋大观二年（1108）—金贞元三年（1155）石窟后室后壁 三佛之左尊



〔图二十六〕志丹城台北宋大观二年（1108）—金贞元三年（1155）石窟后室后壁 三佛之右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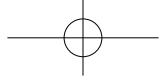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断为卢舍那佛。亦即中尊兼有《华严经》教主毗卢遮那佛尊格，后壁三佛构成《华严经》三身佛组合。

《华严经》三身佛是汉地佛教滋长出来的概念，中国汉文化地区《华严经》思想兴起之后，形成法身毗卢遮那佛、报身卢舍那佛、应身释迦佛三位一体的大乘三身佛概念^{〔1〕}。由于法身毗卢遮那佛等同于密教大日如来，二者尊格也发生混淆，于是在两宋时期流行二者一体化表现^{〔2〕}，实例如大足石篆

〔1〕 （北魏）菩提流支译：《十地经论》（《大正藏》第二十六卷）卷3三《初欢喜地》云：“一切佛者有三种佛。一应身佛，二报身佛，三法身佛”（笔者注：页138中）。又，隋智颢：《妙法莲华经文句》（《大正藏》第三十四卷）卷九云：“法身如来名毗卢遮那，此翻遍一切处。报身如来名卢舍那，此翻净满。应身如来名释迦文，此翻度沃焦。是三如来若单取者则不可也。”（页127下）

〔2〕 前揭李静杰《唐宋时期三佛图像类型分析》。



山北宋元丰五年(1082)第7窟三佛。城台石窟后室后壁三佛之尊格,除《华严经》三身佛可能之外难以找出其它选项,其中尊则是金刚界大日如来与《华严经》教主毗卢遮那佛之混合。

该石窟后室中心佛坛配置主尊,后壁三佛则形成次主尊。中心佛坛圆雕造像遭破坏,已无法得知原初主尊造像的情况。后室左右壁分别高浮雕三尊大像,左右对称配置。左壁中尊坐佛两手在腹前作上下相扣状,右壁中尊坐佛施禅定印,应为阿弥陀佛,基于图像对称配置的考虑,推测其左壁坐佛可能也是一尊净土类尊像。左右壁前尊分别为文殊、普贤菩萨,左右壁后尊为一对水月观自在菩萨。那么,后室左右壁图像可以划分为阿弥陀佛象征的净土信仰、水月观自在菩萨代表的现世救济、文殊与普贤菩萨代表的菩萨行三种功能,其中菩萨行与后壁《华严经》三身佛组合,构成达成法身的思想。前廊高浮雕十方佛、十六罗汉,用意在于往生净土与传承佛法。由此而言,在佛坛主尊造像缺失的情况下,由菩萨行而成就法身形成一条线索,从现世救济到往生净土形成另一条线索,传承佛法则形成第三条线索。

六 金刚界大日如来与二胁侍组合

已知三例,一概着菩萨装,结跏趺坐在基础浮雕三狮子的仰莲台座上,由此推测为金刚界大日如来。三实例各有特点。其一,像位于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1067)第3窟中心佛坛右后柱前面中部骑狮文殊的下方〔图二十七〕,该大日如来左手放在腹前腿上,右手施无畏印,戴桶形冠,衣袖外翻,胸饰缨络。两侧胁侍立云头上,作俗家童子形貌。其二,像位于延安清凉山北宋晚期第2窟后壁三佛的右上角〔图二十八〕,系主体图像完工后补刻内容。该大日如来左手放在腹前腿上握垂下的右手,戴桶形冠,衣袖外翻。两侧胁侍菩萨立云头上,执物供养。其三,像位于延安清凉山北宋晚期第4窟前壁门右侧的上部〔图二十九〕,与门左侧上部的水月观自在菩萨对称配置。该大日如来坐在小屋之中,头部遭破坏,左手放在腹前腿上,右手施无畏印。台座基础前三狮子各在小龕中,类

〔图二十七〕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1067)第3窟中心佛坛右后柱前面中部三尊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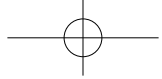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图二十八〕延安清凉山北宋晚期第2窟后壁右侧上端三尊像



〔图二十九〕延安清凉山北宋晚期第4窟前壁门右侧三尊像





似前述柳园石窟的主尊台座。小屋两外侧各立一胁侍，世俗形貌，内侧手执物供养。龕下五身供养人束发、踞坐、合掌，可能具有模仿内四供养菩萨的用意。

上述三例金刚界大日如来附加二胁侍的配置形式，有别于通常的曼荼罗构造，三者也没有施标准的智拳印，更多地吸收了一般化显教图像因素。前二实例处在石窟的次要位置，画面幅度较小，属于填补式表现，未加入石窟主体图像体系，推测系粉本设计者或工匠为避免内容重复而进行的选择。第三实例与水月观自在对称配置，而且处在与比较重要的前壁，受到一定程度重视。至于大日如来两侧胁侍为何立在云朵上，何以作世俗人形貌，尚且难以做出合理解释。

综上所述，陕北宋金石窟大日如来图像已知的六种存在形式，进而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包括金刚界大日如来与四波罗蜜菩萨组合、金刚界五佛、金刚界大日如来与胎藏界大日如来组合三种形式，反映了比较纯正的密教教义。但表现形式改变了曼陀罗的环形配置为并列式配置，人物造型不同程度地受到显教图像因素影响。第二类包括金刚界大日如来与《梵网经》教主卢舍那佛混合、金刚界大日如来与《华严经》教主毗卢遮那佛混合两种形式，将《华严经》与密教的法身观融合起来。在图像组合或造型上兼有《华严经》、密教两者内涵，形成典型的华严式密教图像。第三类为金刚界大日如来与二胁侍组合，更多地吸收了显教图像因素，呈现造型的随意性。

大日如来的六种存在形式，涉及大、中、小各种规格及多种结构石窟，但无论哪种形式其数量都远少于所在石窟的显教图像，思想教化作用也难以与显教图像抗衡。大日如来在石窟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所处位置密切关联，第一种、第五种分别作为主尊和次主尊表现，第二种、第三种处在比较重要位置，以上四种大日如来图像在石窟中形成一条思想线索，分别与所在石窟显教图像代表的思想线索并存，发挥着辅助的教化作用。第四种处在一般位置，第六种处在次要位置，此两种大日如来图像在石窟中几乎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线索，只是一种存在，而缺乏实际教化意义。

陕北宋金石窟大日如来图像构成中国密教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实例可以看作唐代密教图像的后续发展，继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密教图像之后，进一步证实唐武宗会昌法难以降，汉文化地区密教活动依然存续，密教造像也获得新发展。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杨丽丽)